

日军侵华暴行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党福民

为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由河北省中共党史学会、河北省社会科学院、石家庄市社科联、石家庄市中共党史研究会联合举办的“日军侵华暴行国际学术研讨会”,于 1995 年 8 月 16 日至 19 日在石家庄市召开,出席会议的有来自中国 13 个省市和日本的学者共 100 名,还特邀了历史见证人 20 名参加了会议。大会入选论文 61 篇。与会的中日学者就抗战时期日本强掳中国战俘劳工、日军屠杀重大惨案、日军使用细菌化学武器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现综述如下:

(一) 关于日本强掳和虐待中国战俘劳工问题

这方面的论文 25 篇。与会者认为,日军强掳和残害中国劳工,为其侵略战争服务,是日本侵略者在华所犯罪行的一个重要方面,但在半个世纪中,中国史学界对此问题却缺乏研究。相形之下,日本学者,特别是日本华侨中的学者走在了中国学者的前面。他们从 70 年代初就对此问题研究,目前已出版了多本专著和调查报告,并在日本东京、大阪、神户等城市组成多个民间团体,调查并促成此问题的合理解决。有些学者披露,日军先后在北平、天津、石家庄、太原、济南等地建立了五大劳工集中营,将中国军民抓捕关押在这里,经过短期“训练”,源源不断地送往东北及日本充当苦役。从 1936 年至 1945 年 2 月,日本侵略者先后以欺骗、强制手段从华北劫掠劳工出境总数达 695.9 万余人,伴随家属 223.6 万余人,两项总计 919.5 万余人。其中劫往日本本土的近 4 万人,有 7000 多名战俘劳工惨死东瀛。时过 50 年,如今日本国内有些人仍然说什么

么去日本的华工“是劳工不是战俘”，中国劳工到日本是“自愿的”，是“签了契约的”，是“领了报酬的”，是“正当的劳务活动”等等，妄图歪曲历史事实，推卸侵略罪责。提交会议的，由中共石家庄市委党史研究室根据口碑史料和历史档案编辑的《日军枪刺下的中国劳工》资料丛书（8月已由新华出版社出版），用事实揭露了日军强掳中国劳工的罪行。还有人提出，近几年，日军使用战俘劳工问题，作为战后遗留问题已经提上议事日程，韩国、朝鲜、美国，新加坡、澳大利亚等国的战俘劳工都向日本提出赔偿要求。“花冈事件受难者联谊会”已向日本政府和鹿岛建设公司当年的鹿岛组进行交涉，但日本政府一直认为，由于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签订，日中间已不存在战争遗留问题，无视中国受害者的正当要求。对此，一些学者指出，赔偿问题分为政府间的战争赔偿和民间的受害赔偿两个概念，而《中日联合声明》中，中国放弃的只是前者，而后者尚未解决。1992年4月江泽民访日前答日本记者时明确指出：中国政府“放弃国家要求日本给予战争损失赔偿，但是，对民间要求赔偿的动向不加限制”；“日本政府要考虑到中国国民的感情”。为妥善解决此问题，与会学者建议，成立全国性的研究团体，全面调查战俘劳工问题，并与日本就此问题进行交涉，早日得到解决。

（二）关于日军在华制造惨案问题。

与会者指出，日军在中国屠杀劫掠时间之长，杀害人数之多，手段之残忍，造成的财产损失和破坏之惨重，实属人类文明史上所罕见，为历史上最野蛮、最残酷的一页。与会者总结出日军侵华暴行的特点：1. 发生暴行地域广。从旅顺口、胶州湾、东北三省，到华北、华中、华南，中国大片国土都留下了日军的累累罪行。2. 暴行持续时间长。从1874年日军进犯台湾算起，日本侵华历史长达七十余年，而暴行随着日军的铁蹄践踏中国国土，给中华民族的生存、发展，造成长久的祸害，造成人类文明史上的毁灭性灾难。3. 暴行手段毒辣，种类繁多。日军在中国土地上施暴，除大肆烧杀、奸污妇女、掠夺财物等情况外，在东北，为切断人民群众与抗日联军

的联系,日军在多处实行“归屯并户”的“人圈”政策。在东起山海关西抵独石口长城沿线制造 5 万平方公里的“无人区”,共建立 2506 座“集团部落”,被驱赶集家的群众达 1140 万人。在华北、华东、中南抗日力量活动的敌后地区,日军采取“三光政策”,大量屠杀平民,对西北、西南大后方地区,日军实施暴行的主要手段是轰炸,仅四川重庆一地就轰炸数百次,投弹近万枚。炸死炸伤无辜平民 2.6 万多人。与会者认为,今后不仅要进一步揭露日军在华暴行,而且要从理论上探讨日军制造暴行的根源。学者们认为,日军之所以如此野蛮和疯狂,与日本是一个特别好战的封建军事帝国、狭隘民族主义恶性膨胀及官兵受武士道精神和军国主义的毒害等有很大关系。与会者提议,应该将日军罪行桩桩落实,件件立案,支持民间被害者索赔。

(三)关于日军在华使用细菌、化学武器的问题。

与会者指出,日军在中国战场使用了细菌、化学武器,对中国军民造成了严重伤害,这是严重违犯国际公约的罪行。但是,在战后的国际法庭上并未加以追究,而日军在战争期间研究制造和使用细菌、化学武器的罪行也始终未充分揭露;而更为严重的是,大量的细菌、化学武器被丢弃在中国国土上,至今未进行处理,继续危害着中国人民的生命安全。

关于日军在华使用细菌武器问题。与会学者指出,日本实施细菌战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算起至 1945 年战败投降,长达 30 余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 1916 年到 1933 年,是细菌战初期准备阶段。第二阶段从 1933 年 8 月至 1939 年 7 月,为其细菌战的大规模实验阶段。在此期间,它祸害中国东北,建立基地,加紧培养和繁殖各种细菌,研究细菌武器;使用活人进行室内和野外实验。第三阶段是从 1939 年 7 月至 1945 年 8 月,为其实战阶段。日本为实施细菌战,除在中国东北部署七三一部队等外,又在北平、南京、广州等地部署细菌部队,并在多处设有支部或支队。其细菌的种类有霍乱、伤寒、破伤风、鼻疽、鼠疫、瓦斯坏疽菌等。日军在诺门坎、宁波、

常德和浙赣战扬等地先后使用了细菌武器,大量屠杀抗日军民。据日本战犯口供,从1940年至战争结束中国至少有3000人死于细菌战,而据一些研究者调查,被杀害者达1.2万人。与会者认为,多年来,中外人士对七三一部队细菌实验及其罪行比较关注,但对日军在中国其它地区部署使用细菌武器的罪行的调查揭露还不够。

关于日军使用化学武器问题。日本从1918年在陆军兵器局内建立“临时毒气委员会”,到1937年为止,已先后研制出9种化学毒剂,为了保密,分别用黄、红、蓝、绿、茶5种颜色作为代号。七七事变后,在华日军各师团增加了专门的化学部队,配备了能发射化学炮弹的迫击炮和撒毒车等化学武器。日军先后在淞沪会战、徐州会战、武汉会战等多次作战中作用了化学武器。1942年2月8日后,日军第三十六师团在对太行山区八路军的扫荡中,将300公斤芥子气撒布在我军兵营、窑洞、工厂、阵地,结果,数千名中国军民中毒,多数惨死。日军不仅在战场上使用毒气,还惨无人道地对中国平民使用毒气,如冀中定南县的“北疃惨案”就是一例。据统计,在抗战八年中,日军先后在中国的14个省(市)77个县(区),使用毒气2091次,近万中国官兵死亡,41000余人受伤,至于中国平民的伤亡,尚不在其列。近年来,在中国东北、华北各地,先后发现日本战败后遗弃的化学炮弹达200万枚,已使2000多人受到伤害,对环境造成了严重污染。

(四)关于战后日本当局对侵华战争的态度问题。

与会者指出,战后日本历届政府缺乏对侵华战争的认真反省。日本战败时的天皇《终战诏书》,只字未提“战败”二字,对中国则要求“互相不计胜负”地进行交往;80年代后,日本政府连续制造了教科书事件、参拜靖国神社事件及多次否认侵略的严重事件。今年日本国会通过的“不战决议”仍然没有表示道歉悔过,严重淡化当年的侵略罪行。这些与其坚持皇国史观、大东亚战争史观、经营史观是密不可分的。与会者认为,日本坚持这样的态度,不消除日本同国际社会之间历史认识上的差距,是非常不明智的愚蠢之举。它

不仅会影响目前日本政局的稳定,影响日本发展战略的选择,而且更重要的是影响中日关系和它与亚洲各国的关系。今天的中国及亚洲已非昔比,日本对侵略历史缺乏反省态度,不道歉、不反省、不谢罪、不赔偿,就不可能得到中国及亚洲各国人民的理解和信任。

(作者单位:中共石家庄市委党史研究室)

《鄂豫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史稿》出版

由鄂豫边区革命史编辑部编著的《鄂豫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史稿》一书,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共37万字。

该书反映了鄂豫边区人民和新四军第五师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坚持武汉外围敌后抗日游击战争,艰苦创造鄂豫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光辉历程。

(张肇俊)